史海探源

越南史籍中华侨华人的称谓与界定 *

平兆龙
（暨南大学 文学院 / 澳门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越南；华侨华人；中越关系；明乡人

［摘 要］论文梳理了越南有关华侨华人的词汇与分类，对有关华侨华人易混淆词汇进行了辨析。通过对越南史籍的文献统计梳理、华侨华人称谓的比对，初步探究出其命名规律与特定含义：一是对旅居越南的华侨华人以“唐人”“北客”等为泛称；二是依照中国朝代、方位、区域以“宋人”“清人”“北人”“广东人”等来命名；三是以特殊的名称“艚人”“明乡人”等来指称。界定华侨华人与越南人共同使用的词汇十分重要。“北人”“汉民”“华民”等称谓在中国语境指代中国人而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越南语境下却指越南人。厘清越南文献中涉及中国人的称谓，是华侨华人研究的基础，对研究越南华侨华人的社区生态与对居住地发展的贡献均不无裨益。

［中图分类号］D634.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21）03-0082-09

An Analysis of Terminology on Overseas Chinese in Vietnamese Historical Records

PING Zhao-l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 Academy of Macau,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Vietnam; overseas Chinese; Sino-Vietnam relationship; Người Minh Hương

Abstract: China and Vietnam, two neighbors sharing a same race and language, had frequent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in history, so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records are left in ancient Vietnamese documents. Given that times and places varied, there have been many misunderstandings of different appellations applied to the Chinese in Vietna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rms for Chinese people in Vietnam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identify some rules and specify the meaning of some terms. First of all, Người Đường、Bắc Khách etc. referred to the Chinese living in Vietnam. Next, Người Song, Người Thanh, Người Bắc, Người Quảng Đông, etc. were named after Chinese dynasties and localities. Thirdly, there were other specific terms such as Người Tàu and Người Minh Hương. It is important to point out that terms such as Người Bắc, Dân Hán, and Dân Hoa in certain contexts actually referred to Vietnamese people rather than the Chinese in Vietnam. Clarifying the Chinese appellation in Vietnamese literature is a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the Chinese overseas. It is also of great value to understand the

［收稿日期］2021-01-20；［修回日期］2021-03-16

［作者简介］平兆龙（1988—），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澳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越南华侨史。

* 本文系 2018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从华人到越人：越南明乡人研究（1650—1957）”（GD18XHQ0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17—19 世纪越南粤籍华侨华人文献整理与研究”（GD18TW18-06）之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陈文源、吴青、牛军凯、潮龙起、严艳等诸位老师的指点，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重要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ommunity ecology of the Chinese in Vietnam and to appreciate their contribution to local developments.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越南语中，Gốc Hoa（华裔）、Người Hoa（华人）、Hoa Kiều（华侨）、Người Đường（唐人）、Người Minh（明人）、Người Thanh（清人）、Người Minh Hương（明乡人）等是较为常见的用于指代相应华侨华人的词汇。在英文文献中，指代华侨华人多用 Chinese、Oversea Chinese 等词汇，还有更为细致分为各个地方的华侨华人，有 Cantonese（广东人）、Fukienese（福建人）、Hakka（客家人）、Teochin（潮州人）等。不管现代越南语及西方语言使用何种词汇，一般都不存在混淆华侨华人和当地人的情况。

但是，越南史籍中的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越南史籍中存在大量指代华侨华人的称谓，易与指代越南人的词汇相混淆，这在一些史料汇编及学术论文中并不少见。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中越两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越南北部有千余年隶属于中原王朝，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礼仪等长期浸润此地，即便在 10 世纪独立建国之后，“仍不得不受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国粹，即使今天想清除它，也不易一时涤荡干净。”[1] 中国学者也认为，“在环绕中国的邻邦中，与中国接触最早，关系最深，彼此历史文化实同一体的，首推越南。”[2] 从后黎政权起，为了加强与完善其封建统治，越南统治者系统地仿效了明朝的官僚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儒家思想浸透于越南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因此，美国学者李伯曼认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阶层和地区，源于中国的社会活动和规范在 1830 年比 930 年明显得多，这是因为，操越语的人群受到北方无与伦比的文化吸引，开始选择吸收、消化中国文化，以适应本地需要并塑造民族认同。”[3] 因此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各种词汇被越南人所借用也很常见。

二是脱离历史的语境，不了解古代越南的特定用语含义。自秦汉起，一批批中原汉人移居于此，汉越融合乃越南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① 张秀民认为，越南历代王朝的创建者都有中国血统。[4] 韩振华则指出，李朝的创建者李公蕴和陈朝的创建者陈日煚都是福建晋江安海人。[5] 这些越南国王也自称“汉人”，而且就像中国文化、治术、以及古史所述一样，是“天子”。[6] 吴甲豆（Ngô Giáp Đậu）在《中学越史撮要》中细数历代中国人移居越南的历史，认为“能以文事武功显名诸国，多从华裔中来。”[7] 不仅上层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普通越南人也一样。20 世纪初，陈重金（Trần Trọng Kim）认为，今天的越南人是由当地原有的苗裔与中国人混血而成。[8] 而黄高启（Huàng Cao Khải）更是认为，“我南民族盖即汉族无可疑矣”。[9] 上述三位越南学者的论说均指出越南人与中国人的紧密联系。其次，越南精英一直认为他们传承了儒家的正统，因此越南独立建国之后，在与周边国家交往时习惯以“华夏”、“中国”自居。1300 年，面对元朝的入侵，越南陈朝主将陈国峻在檄文中称：“汝等坐视主辱，曾不为忧？身尝国耻，曾不为愧？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听太常之乐，宴飨伪使，而无怒色？”② 这是目前所见越人最早自称“中国”的记录，越人并不认为其是“蛮夷”，甚至称宋人为“宋鞑”、元人为“胡虏”。在与占城交往时越人也屡次自称“中国”。1434 年，“占城掠化州人。占城主布提闻太祖崩，以帝初嗣位，疑中国有变，亲将兵出屯近境，欲谋入寇。”[10]

① 有关郡县时期越南的历史，可参见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1945 年。

②《大越史记全书》各版本之间有“中国”与“邦国”的区别。引田利章校订本（东京：埴山堂，明治十七年，第 487 页）、陈荆和校合本（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4 年，第 380 页）、《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 4 辑第 2 册，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黎朝正和十八年内阁刊本影印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22a 页），以上三种都作“中国”。但在孙晓主编的标点校勘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19 页）中却为“邦国”，经询问牛军凯教授，他指出应是校勘者弄错了。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11 页）也认为，这是越南文献第一次自称中国。笔者从之。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687 年，旨准外国人不得杂居华夏。[11]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① 至阮朝时，在官修史籍中更是普遍使用汉人、汉民、华民等词汇来指称越人。因此，今人很容易将彼时之用语和当下常用词语相混淆。

学界对越南华侨华人相关概念也进行过探究。张文和认为，《嘉定城通志》所载“华民”是指明乡，“唐人”是指清人，二者皆是华侨。[12] 这里就误解了华民的真实含义。金雨雁从阮朝史籍中梳理出所载的“华”、“汉”称谓，并指出两者均指代越南人。[13] 逐风天地指出，阮朝使用“华”、“汉”所指的时间范围是阮初至启定朝的百余年间，并阐明了原因。[14] 越南学者周海（Châu Hải）、陈庆（Trần Khánh）对“华人”、“华侨”等词汇也进行过界定，但并未进一步分析其中的规律。[15]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搜集越南史籍中的相关称谓词汇，分析相关文献的历史语境，试图探讨这些称谓形成的原因及规律，并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笔者不揣谫陋，祈请方家指正。

二、有关华侨华人的词汇与分类

十世纪越南独立建国以后，不仅追求政治上的独立，而且在文化意识方面也一直尝试构建其独立性，希望与北方大国相“抗衡”。因此，对于来自北方的人与物，在其文献记录中就具有明显的特征，有时所用之词汇也会因时而异，带有时代的印记。现以《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主要史籍为基础，通过大致的分类与辨析，来了解古代越南对华侨华人的习惯称谓。

（一）泛称类的词汇

唐人（Người Đường）。《辞海》曰：唐代盛时，声誉远及海外，后来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16] 据泰勒（K. W. Taylor）考察，唐代安南一直都存在数量稳定的来自北方的军人、高级官员、皇室成员以及被流放的官员。这些人不少最后就落籍当地，并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7] 唐人不仅对当时的安南有着重要影响，“唐人”一词也被后世用于泛称华侨。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18]《明史》载：“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呼也。凡海外诸国尽然。”[19]《池北偶谈》载：“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20] 19 世纪的越南史籍沿用“唐人”一词作为旅越华侨的总称，在“唐人”之中又以移居越南之先后分为“明人”、“清人”。[21] 1820 年编成的越南南部地方志《嘉定城通志》载，越南人“俗称大清人为唐人，犹四夷称中国人为汉人，非刘汉之汉，李唐之唐”。[22] 一般而言，每个时代的“唐人”指称彼时之华侨。此外，“唐人”不仅是越南对华人的称谓，也是海外各国对华人的称谓，海外华人也以此自称。

以“北”字为首的泛称词汇。越南虽然脱离中国而独立，但人文与经济的交往却日益频繁。为区别与中国的关系，越南以居于天南，自称南国，而称中国的人与物为北客、北商、北货、北书、北药等。1287 年，“庆余初镇云屯，其俗以商贩为生业。饮食衣服皆仰北客，故服用习北俗。”[23] 这里的“北客”（Bắc Khách）指中国商客，“北俗”（Bắc Tục）指中国习俗。1288 年，“元乌马尔犯龙兴。……庆余阅诸庄军令曰：云屯镇军所以防遏胡虏，不可戴北笠，仓卒之际，难于辨别，宜戴麻雷笠，违者必罚。”[24] 在双方交战之时，陈朝为区分彼此，要求越方军队不能戴“北笠”。

明清时期，中越朝贡往来中贸易的意义并不明显，但是私商跨境贸易却与日俱增，越南对来自中国的商人也习惯称之为北商（Bắc Thương）。1731 年，黎郑“饬太原、高平巡关，严加盘诘北商，以防奸细”。[25] 1749 年，又“定北商艚税例。艚准税钱八百贯，舰六百贯，小舰五百贯，择廉干掌之”。[26] 越南历代政府对于华商的管理较为严厉，对于逃税、搬运违禁物品严惩不贷。1750 年，黎

① 有关越南华夷秩序建构的历史，可参见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孙建党：《“华夷”观念在越南的影响与阮朝对周边国家的亚宗藩关系》，《许昌学院学报》2013 年第 6 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郑下令“申严北舰偷搬禁。先是，北商回帆，讥察最密。”[27] 18—19 世纪，越南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华商运米出境。1758 年，“时，北来商艚凑集东南海门，以轻舸籴米民间。”[28]

除了商客，还有“北方道士”对越南道教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302 年，“时有北方道士许道宗随商舶来，居之安华江津。符水、斋醮、科仪兴行，自此始。”[29] 类似以“北”为首字的词汇不胜枚举，皆是越南人指称中国人与物的专有名词。

华人／华族（Người Hoa）。华人，中国人的简称，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30] 华侨（Hoa Kiều）一词，晚清时才出现，至 20 世纪 30 年代，越南史籍将在越谋生的中国人称为“华侨”、“华人”。[31] 华族是最后出现的称谓词汇，是目前越南政府法定的 54 个民族之一。就华人或华族而言，越南政府和学者的定义一致，即华人是指具有汉族血统或被汉化的、在东南亚国家长期且相对稳定生活的、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但仍保留中国文化部分特质的、自我认同为华人的群体。他们是来自中国且较少或者尚未被迁入地族群同化的移民，是正身处民族融合过程中且构成东南亚国家居民、民族一部分的、正逐步调整自身并融入民族国家、地区与国际等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的族裔群体。[32]

（二）朝代 + 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

越南独立以后，一般以朝代名称呼北方大国，对来自北方的人则以“朝代 + 人”相称，如宋人、元人、明人、清人。这种称谓在越南重要史籍中并不会因时代迁移而进行修正，如《大越史记全书》历经多次增修，但对前代的称谓并没有作相应修改。

宋人（Người Tống）。宋朝人的简称。1273 年，“宋人来附。先是，宋国偏居江南，元人往往侵伐。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萝葛源。至十二月，引赴京，安置于街媾坊。”[33] 这是越南史书中有关华人成规模移居其地的最早记载。因朝代鼎革，宋朝末年大量宋人流寓安南、占城等地。[34] 除了宋人遗民，还有宋商（Tống Thương），即宋朝商人。1128 年，桄榔场献宋商人漂船九只。[35] 1347 年，先是宋商舶来进火浣布一匹，留为重宝。[36]

元人（Người Nguyên）。元朝人的简称。1350 年，“元人丁庞德来归。元国乱，四方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优人丁庞德者挈家来附，纳之。缘竿戏剧此始。”[37] 元末，大量中国人移居安南、占城等地，为当地带去戏曲、医术等中国文化。

明人（Người Minh）。明朝人的简称。1438 年，后黎朝“令明人着京人衣服，断发”。[38] 1467 年，“安邦镇守官奏，明人载粮船漂至本处。……竟留明人不还。”[39] 黎利复国以后，“官吏将士得还者止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40] 明朝在从越南撤军时，遗留在越大批士卒，这些人被黎利分散安置于越南各地。明末清初因不满清人统治，杨彦迪集团、鄭玖家族等移居越南，这些明人后裔对当地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越南史籍中也将“明人”称为“吴人”。属明结束，后黎朝开国功臣阮廌所撰《平吴大诰》被视为越南的第二次“独立宣言”，其中也是用“吴”字而不是“明”字。阮廌在《舆地志》中也多次使用“吴”字，“国人毋得效吴、占、牢、暹、真腊诸国语及服装，以乱国俗。……吴人久沦元俗，被发白齿，短衣长袖，冠裳灿烂，如叶之重者。”[41] 其中不乏贬义。1462 年，“明遣正使行人司行人刘秩来谕祭于仁宗。旨挥文武百官中都府路县军民之家，某有吴人奴婢，不得放行通同客使。”[42] 尽管目前学界关于“吴人”的含义尚存争议，[43] 但并不妨碍证明当时越南人较为普遍使用“吴人”来称呼中国人。

清人（Người Thanh）。清朝人的简称。有清一代，除了不服清朝统治的明朝遗民之外，还有大量中国人因经商、采矿、做工等移居越南。1663 年，“令区别清人来寓者。辰清人多侨寓民间，致风俗混杂。乃令各处承司察属内有清国客人寓居者，随宜区处，以别殊俗。”[44] 1717 年，因越南各地矿厂“多募清人掘采，群聚日众”，为此“定诸镇场矿限制”。[45] 大量清朝移民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还在当地政府供职。1803 年，“以清人郑猷为北城该府艚，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监收商舶税。”[46]有关清人的记载，在越南史籍中不绝于史。商人是清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南史籍一般称为“清商”（Thanh Thương）。随着清人移民的增加，越南统治者逐渐加强对这些以群体的管理，将其编户齐民。1698 年，“又以清人来商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今明乡］，于是清商、居人悉为编户矣。”[47]阮廷对于遭遇海难的清商、渔民等也加以救助，严惩地方官员抢掠这些人的财物。如 1822 年，“清葩有清商林长盛难船泊于漪碧海口，守御潘文理纵民夺其货”。明命帝高度重视此事，要求刑部彻查，最终将潘文理流放。[48]

此外，越南人对清人还有“天朝人”的称呼。1688 年，潘鼎珪游历宪庸（Phố Hiến），并在《安南纪游》记载：“轩内（即宪庸）者，去其国都只百十里。凡四方洋船贩其国，悉泊焉。设官分镇其地。有街市数十，曰天朝街。尊我中夏曰天朝，称我中夏人曰天朝人，沿旧制也。”[49]

清朝大批的中国商民移居越南后，习惯性地聚族而居，成立以乡缘为特征的商会组织，修建会馆，相互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阮氏王朝在加强对中国移民的管理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利用这些组织，实现“以华治华”的目的。[50]1802 年，阮朝建立之后正式将清人分帮管理。维新《大南一统志》载：“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物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51]会安是极为典型的华侨聚居区，直至今日当地尚保存着大量华人遗迹。

（三）中国行政区名称 + 人：广东人、福建人

广东人（Người Quảng Đông）。人数最多，包括广肇、潮州、海南和一部分客家人。明末清初，大批明朝遗民“义不臣清”、“留发而南投”移居至越南等地，其中的代表人物杨彦迪、陈上川等都是广东人，为开发南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上川，字胜才，广东人。……上川驻芹蓀海口，驻札于盘辚（今属边和），彦迪、黄进往雷鼠海口，驻札于美湫（今属定祥）。辟闲地，构铺舍，清人及西洋、日本、阇婆诸国商舶凑集，由是汉风渐渍于东浦矣。”[52]另一位著名人物鄚玖，是“广东雷州人。明亡，清人令民薙发，玖独留发而南投于真腊，为屋牙”。[53]1708 年，阮主“以鄚玖为河仙镇总兵”。[54]鄚氏家族后在河仙开发银矿、通商贸易，使河仙成为东南亚地区著名的“港口国”。

越南北部山区富集矿产资源，吸引了大批广东人来此开采。“于是一厂客人至以万计，圹丁、礵户结聚成群。其中多潮、韶人，犷悍好斗。每争矿口，辄兴兵相攻，死者投诸堑。”[55]《历朝宪章类志》载：“北国人往来开场作煤，无有限制。送星厂所留韶州客人至三万人。”[56]1767 年，因太原省送星银厂的斗殴事件，黎郑派官经理，引发多达 2000 多人潜逃回国。[57]这些人中以广东潮州、韶州等府的人居多。

在西山朝时期，广东人成为各方拉拢的重要力量之一。1775 年，“时，五福进军，南人有北客集亭者，与西山阮文岳合。集亭皆广东人，每入阵，先饮之酒，人持一刃，头戴北梭纸银，曰死以此为赠，赤身直往，不避矢石。岳倚之以抗官军。”[58]阮朝建立之后，嘉定三大家之一的吴仁静，“其先广东人”。[59]可见，在 17—19 世纪的越南历史之中，广东人及其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占据重要地位。

福建人（Người Phúc Kiến）。就其人数而言仅次于广东人，位列第二，在越南华侨华人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阮朝历史上有名的大臣，如郑怀德，“一名宝，字止山，号艮斋。其先福建人，世为宦族。”[60]另一重臣陈践诚，“其先北国福建人”。[61]类似官至高位，并有福建人血统的不乏其人。此外，福建人在越南经济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除广东人、福建人比较常见之外，还有广西人、云南人等。

（四）以特殊词汇来命名：明乡、明乡客、艚人

明香人／明乡人（Người Minh Hương）。狭义上是指越南京族内的华人后裔群体，广义上是指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明清以来华人与当地人通婚所形成的混血儿。[①] 该群体肇始于明末清初，起初主要由旅越商人、明朝遗民等与当地人通婚所形成。其后不断融入清人后裔，遂遍及全越各地。在“五帮”之外，单独形成明乡帮。《国史遗编》载，阮廷于1811年“诏所在讥察唐客，即北客住寓者，亦谓明乡，系有商贩往来，须领章跡凭批”。[62] 此说有一定问题，将明乡和北客混为一谈。北客多从属于五帮之内，而明乡则独成一帮，北客在越所生的子孙后须加入明乡帮，二者虽有联系但非同一群体。1827年，“改正北客为明乡……北客旧号明香，均改著明乡正字面。”[63] 从此以后，“明乡”成为法定的用语，也标志着明乡人成为阮朝的编户齐民。1842年，阮廷规定清人子孙“不得薙发垂辫”，年满十八岁即加入明乡社，“依明乡例受税，不得仍从该祖父着入清人籍”，也不得回归中国。[64] 至20世纪50年代，中越两国就明乡人的国籍问题达成共识，他们几乎都落籍越南，成为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的一部分。

艚人（Người Tàu）。古代中国人前往越南一般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时间越往后，水路占据的比重越大。南阮北郑纷争时期，中国商人乘“大眼鸡”帆船趁着北风南下，运货抵越，翌年春耕收获，乃载米北归，此运粮船名曰艚船。越人习俗呼船曰艚，而称中国商人曰艚人。[65] 阮氏王朝设有专门的官职——该艚，“该艚者，专管唐人及总理船只事务，以该伯为之。”[66] 在当时的语境之中，“艚人”的语义并无褒贬之分，仅是一般的称谓词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词汇的语义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越南国语字中出现了一个针对中国人的俗称“Người Tàu”，但该词汇带有贬义。[67] 范宏贵、刘志强二位教授甚至认为，这是对华人的蔑称。[68] 该词汇的语义发生变化反映了言者和听者在长期互动过程中的彼此认知，其中原因极为复杂。

三、有关华侨华人易混淆词汇辨析

与越南华侨华人相关的称谓词汇数以十计，其中，最易混淆之词汇是汉人、汉民、华人、华民、北人。在今人的论著之中，经常出现将越南史籍中的“汉人”、“汉民”、“华人”、“华民”、“北人”等误认为中国人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词汇进行辨析和界定，以正视听。

北人（Người Bắc）。越南北接中国云南、广西等省区，以方位来论，中国在北，越南在南，故而其称中国为北国，中国人为北人，中国的朝代为北朝等。与北人相对者即南人，一般是指越南人。如若是“北国人”，毫无疑问是指中国人，但若是“北人”则需进行判断。“北人”的记载在越南文献中十分常见，如988年，“太师洪献卒。献，北人，通经史，常从征伐，为军师及劝进谋议国事，有大功，帝以腹心委之，至是卒。”[69] 1737年，“禁北人入清、乂境。时北人多潜入山林，窃采桂皮，故申是禁。”[70] 10—15世纪，越南文献中的“北人”均指中国人，但是，此后越南文献中的“北人”则并不一定是指中国人。由于16—18世纪末后黎朝分为北郑南阮两个敌对政权，双方以灢江为界，越南内部有着显著的南北之别。阮氏王朝及阮朝的史书中的“北人”一般是指灢江以北的越南人。如在广平营北部“先朝有设巡守三所，以御北人潜入”。[71] 再如1821年，明命帝巡幸北城时发布上谕曰：“列圣开创之初此为战地，将士为国捐躯埋碧之场也。北人抗我颜行不得不加之锋镝，然各为其主致命耳！”[72] 是年十二月，清使广西按察潘恭辰至越，……帝大悦，谓侍臣曰：“清使以十九日祭，恰值祥礼，自丁、李、陈、黎以前，北人来祭未有如此凑巧，得非我皇考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然欤！”[73] 这两条史料中都出现了“北人”，但是，显然二者含义不同，前者是指灢江以北的越南

① 当前中外学界有关明乡人的研究，参见藤原利一郎：《安南の“明鄉”の意義及び明鄉社の起源について》，《文化史學》1952年第5期；陈荆和：《关于“明乡”的几个问题》，《新亚生活双周刊》1965年第8卷第12期；李庆新：《越南明香与明乡社》，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5~223页；Charles James Wheeler，“Identity and Function in Sino-Vietnamese Piracy：Where Are the Minh Hương?”*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16（2012），pp.503-521；Lê Thị Vỹ Phượng，“Người Minh Hương-dấu ấn di dân và Việt Hóa qua một số tư liệu Hán Nôm”，*Tạp Chí Khoa học xã hội*，số7，2013，tr.66-73；平兆龙：《明乡人及其异国科举之路——以越南嘉定明乡社为中心》，《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而后者指则的是中国人。因此，在查阅史籍时既要了解时代背景，又要结合特定的语境来解读，尤其是对阮氏王朝乃至阮朝时期文献中的“北人”要进行审慎判断。

汉人（Người Hán）。现代汉语之中，汉人一般是汉族人的简称，但在古代所表示的意思却有较大区别。陈寅恪先生就曾提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74] 这种以文化而非种族来区分族属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是极为常见的现象。[75] 实际上，越南古代也受此影响。17 世纪，“柴末府汉人、唐人与真腊、阇婆人商贾凑集”。[76] 这里的“汉人”是指越南人。《大南寔录》中至少出现 16 次“汉人”，无一例外都是指越南人。一般以特定的顺序出现：“汉人、清人、腊人、阇婆人”，或是“汉人、唐人……”等等，都是“汉人”在前。

除了“汉人”外，“汉民”一词也常出现在越南史籍之中。1833 年，宁平护抚黎元熙密奏，言：“省辖乐土、安化、奉化三县土俗专尚狡诈……此狡蛮风俗与汉民不同，所以难治也。”[77] 明命五年，议定河仙税例为：“汉民视诸镇客户例，唐人视嘉定明乡例。”[78] 从上述例子可知，不管是与边疆少数民族还是与中国人交往时，越南人均以“汉民”自居。

类似的词汇还有“华民”。《嘉定城通志》中多次出现“华民、唐人、高蛮”的记载，[79] 排序一般也是“华民”在前，指称越南人，说明嘉定城管辖的广大地域内这三个族群杂居在一起。1841 年，绍治帝继位，为避其母顺德仁皇后胡氏华的名讳，随后“华”字被定为避讳字，“华民”改称“汉民”。[80]

四、结语

世界各民族在交往中均会产生以自我民族为本位的对其他民族的各种称谓，这些称谓有褒有贬，不一而足。越南也不例外，在其史籍中存留大量指代华侨华人的专门称谓，通过排列比对，亦可发现其中的规律。

其一，越南史籍中有关华侨华人的称谓多种多样，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亦使用不同称谓。有以“唐人”、“北客”等为泛称，亦有依照中国朝代、方位、区域以“宋人”、“清人”、“北人”、“广东人”等来指称，还有以特殊的名称“艚人”、“明乡人”等来指称。可见，古代越南称呼华侨华人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此之多的称谓词汇，选用何词来指代在越中国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同作者也会偏好不同的称谓词汇。

其二，界定华侨华人与越南人共同使用的词汇十分重要。对于越南史籍中出现的“北人”、“华民”、“汉民”等易混淆的词汇，一定要注意其确切词意。实际上，族群称谓词汇是区分“我者”和“他者”的重要标志。当多个族群名称同时出现时，越南史籍中的排列顺序一般为越南人在前，其他族群在后。当然，不管越南史籍中使用何种词汇来指称华侨华人，都不能离开当时的语境去理解词义，否则就容易张冠李戴。

其三，华夷秩序观念影响着越南对相关词汇的使用。深受中国文化濡染的越南王朝，以华自居，演变为小中华、南天中华，以自我为中心构建起一套“华夷”秩序，在与周边国家占城、柬埔寨、老挝等交往时，其史籍中出现类似中国、华夏、汉人、华民等词汇来指代越南与越南人，以此作为区分彼此的“手段”。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刺激了周边国家对于华夷秩序的自我建构。韩国学者刘仁善认为，“阮朝的君主和知识分子尊重中国文化，并努力效仿，但是对于清朝和清人却毫无尊敬之心。称清为北朝或清国，称清人为北人或清人。此外，将中国人称为唐人的情况也很多，这多半是因为清朝是异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抱有蔑视的态度。”[81] 阮朝统治者对待清朝的心态在华侨华人称谓上也明显地体现出来。无独有偶，17 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朝鲜陡然以中华正统而自任。[82] 日本学者则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华夷变态”。[83] 因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与中国逐渐疏离，东亚文化共同体解体，形成“地虽近而心渐远”的局面。[84]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何越南以“汉人”、“汉民”、“华民”等词汇来自称了。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注释］

［1］［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页；Alain G. Marsot，*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Vietnam under the French*，Lewiston：The Edwin Mellen Press，1993，p.22.

［2］郭廷以:《中越一体的历史关系》，郭廷以等著:《中越文化论集》第1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第1页。

［3］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Vol.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41.

［4］张秀民:《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收入氏著:《中越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11~21页。

［5］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收入氏著:《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7~100页。

［6］［美］克里斯托佛·高夏著，谭天译:《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73页。

［7］［越］吴甲豆:《中学越史撮要》之《首集·族类》，河内：北圻学政会，1911年，第9页。

［8］［越］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页。

［9］［越］黄高启:《越史要》卷1，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编号：R.174，1914年，第5页。

［10］［23］［29］［33］［35］［38］［39］［69］［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1、299、322、282、207、554、616~617、134、386页。

［11］《黎朝诏令善政》卷4《礼属下》，西贡：平敏印刷厂，1961年，第338页。

［12］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第38页。

［13］［21］金雨雁:《十九世纪越南史籍中的“华、汉”含义的考证》，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文集》，1982年，第29~37页。

［14］［31］［80］逐风天地:《阮朝时代越南以“华民”、“汉人”自指略述》，越南历史研究公众号，2018年6月16日，https://mp.weixin.qq.com/s/gms2sUGs4iDfPc_0_QbeSg。

［15］Châu Hải，*Các nhóm cộng đồng người Hoa ở Việt Nam*，Hà Nội：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1992.；Trần Khánh，“Bàn về thuật ngữ và khái niệm người Hoa Đông Nam Á”，*Nghiên cứu Đông Nam Á*，số2，1997，tr.115–124.

［16］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956页。

［17］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183–187.

［18］（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州可谈》卷2，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页。

［1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4《外国传·真腊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395页。

［20］（清）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21，齐鲁书社，2007年，第415页。

［22］［79］［越］郑怀德:《嘉定城通志》，戴可来、杨保筠校点:《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4、77、82、91、101、102、226页。

［24］［36］［37］［44］［45］［越］阮朝国史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台北：“中央图书馆”，1969年，第1079、1253、3011~3012、3228~3230页。

［25］［26］［27］［28］［42］［55］［58］［70］［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续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60、1126、1127、1144~1145、600、1162、1184、1075页。

［30］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280页。

［32］Trần Khánh，*Người Hoa trong Xã Hội Việt Nam: Thời Pháp thuộc và dưới chế độ Sài Gòn*，Hà Nội：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2002，tr.35.

［34］陈学霖:《宋遗民流寓安南占城考实》，收入氏著:《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339~369页。

［4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1《外国传·安南》，中华书局，1974年，第8325页。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41][越]阮鹰:《抑斋遗集》卷6《舆地志》，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藏，福溪藏板嗣德戊辰（1868）本，编号R.964，第30页。
[43] Liên Giang, "Biện Chính Hai Tiếng Thằng Ngô", *Tri tân tạp chí*, tháng7, 1941, tr.11&15.; Stephen O'Harrow, "Nguyen Trai's "Binh Ngo Dai Cao" 平吳大誥 of 1428: The Development of a Vietnamese Nat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0, No. 1 (1979), pp.159–174；约翰 K. 惠特莫尔著，印驰译:《天长府的命运：从十五到十六世纪山地与海洋在大越地区的分裂》,《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魏超:《越南阮鹰〈舆地志〉对"越地"的空间想象与诠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46][50][越]阮朝国史馆:《大南寔录正编第一纪》，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3年，第637、359页。
[47][52][53][54][76][越]阮朝国史馆:《大南寔录前编》，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年，第103、279~281、273~274、111、273页。
[48][72][73][77][越]阮朝国史馆:《大南寔录正编第二纪》，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71年，第1645、1576~1578、1596、3055~3056页。
[49]（清）潘鼎珪:《安南纪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6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50页。
[51][61][越]高春育等修:《大南一统志》，东京：印度支那研究会，1941年，第709~710、380页。
[55][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续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62页。
[56][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西贡：保荣出版社，1957年，第60页。
[57]平兆龙:《从越南宋星银厂事件看清代中越边境矿工问题》,《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9][60][越]阮朝国史馆:《大南正编列传初集》，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2年，第1139、1134页。
[62][63][越]潘叔直辑:《国史遗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1965年，第72、163页。
[64][越]阮朝国史馆:《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卷44，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80页。
[65]华侨志编纂委员会:《越南华侨志》，台北：台湾华侨志编著委员会编印，1958年，第32页。
[66]陈荆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笺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8年第1卷，第216、225页。
[67]钟珊:《17—19世纪越南南方华人与中越文化交流融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68]范宏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71][越]黎光定纂修:《皇越一统地舆志》卷3，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
[7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7页。
[75]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78][越]阮朝国史馆:《明命政要》卷17《财赋》，西贡：国务卿府特责文化出版，1974年，第5a~5b页。
[81][韩]刘仁善:《19世纪的越中关系和朝贡制度：理想与现实》,《东北亚历史杂志》2009年第6卷第1期。
[82]孙卫国:《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之嬗变（1627—1910）》，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第39~62页。
[83][日]林春胜、林信笃编著:《华夷变态》"序"，东京：东洋文库，1958年，第3页。
[84]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6年第3卷第1期。

[责任编辑：张焕萍]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